

导师 释根通 主编 冯巧英 赵桂溟

山西佛道抚存

上

诗
墨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前言

QIANYAN

根通长老主持山西政协民宗委工作 20 年,对山西宗教文化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他常说起,20 年的民宗委工作中总有一丝遗憾,山西号称文物大省,却不是文化大省,更不是文化强省。其中的宗教文化研究更是与丰厚的资源不成比例。

诚然,现在人们都接受了“宗教是文化”的说法,但宗教文化难道只是修堂、盖庙、造像、立塔,作为旅游的一部分而体现其价值吗?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对信众而言就是他们的人生观。宗教是历史形成、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自有人类社会就有了宗教。宗教对社会科学如哲学、文学、艺术,对自然科学如医学、天文、建筑等,对人们的道德观念都有很深的影响。20 世纪末,有我省贤达提出了“五千年中国看山西”的论点,十多年来,对这一说法虽还存在争议,但已被大多数论者接受。看山西 5000 年的什么呢?有的文章说是“文明”,有的文章说是“文化”,更多的不甚计较,同一篇中“文明”“文化”错落出现。实则“文明”与“文化”是不尽相同的概念,“文明”是历史上客观事物的外在性形式,“文化”则标志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考古发现和传说记载都证明,距今约 5000 年前唐尧以平阳(今临汾)为都城的时代,已出现了文字,形成了国家体制(雏形),兴修水利、敬敷五教……中华最早的文化始于山西。其后夏商周秦汉魏晋……中国历史的每一篇章在山西都可以找到浓墨“书写”的“记录”。那么,宗教文化在其中有怎样的位置呢?



2010年我省敲起了转型发展的鼓点,文化的深化发展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于是时,根老提出了梳理我省宗教文化,初步整理山西佛道教资源的想法,委托我们做些工作。2010年冬开始了撰写《山西佛道春秋》一书的准备工作。在整理资料、编辑撰写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看法。以下观点虽与各地现存实际状况未必能一一对应,但对整体认识山西佛道教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是有所裨益的。

一、山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位置

现在佛教界都公认佛教正式被中国朝廷承认、接纳是在东汉永平年间(58—75),明帝“夜梦金人”,而引出“白马驮经”的故事,开始有了白马寺,表示佛教传入。请注意,这是朝廷正式承认佛教,不等于佛教最早传入时间。《后汉书·楚王英传》里曾引述明帝永平八年(65)诏书说刘英“尚浮屠之仁祠”。刘英的王都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可见公元一世纪时,佛教在上层社会(包括朝廷)已颇有影响,佛教传播地域也甚广。查历史文献,我们知道汉曹魏时代只许西域僧立寺,汉人是不许出家的。又,佛教初来时人们把佛教徒的斋戒和中国传统的祭祀混为一谈,把西域僧的斋戒之所,都称为“祠”。所谓洛阳白马寺、颍川许昌寺等等早期“寺庙”,都是后人追述的。当时的汉明帝请来摩腾、竺法兰“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是否就是白马寺?这是《高僧传》作者的说法,后来成为通说罢了。由西域来的佛教徒绝不只是进入宫廷、王府的那些,应该还有许多苦行乞食游方的行脚僧,他们足迹所至,一方面是有随意性,无序可求,另一方面他们是暂时落脚,按据说是汉明帝时译出的《佛说四十二章经》——传说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佛经——书中说游方僧“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那如果是身体出了毛病或有信众挽留,结个茅庵多住几日,也是情理中事。早期佛教是讲神通的,他们后来走了,这里就留下了有关菩萨、罗汉的传说。晋初佛教大盛时,也许又有僧人来此立祠寺,或有信佛者以此为圣迹,后人就传说或记载这里汉代就有佛寺了。这些“佛寺”断非唐宋以来人们心目中寺院的样子,其规制与后者不可同日而语。

佛教何时传入山西的呢?具权威的应该是方志记载。据光绪版《山西通志》——此志曾历代数修,有多种版本,首创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至清光绪十八年(1892)最后一版成书,400余年间经不断增补订正。光绪年间的纂修者又都是当时著名学者、考据学家,书成后梁启超曾称其为“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所载当时全省汉代建寺遗迹,除五台山外有16处,有的还记有始建年代、具体位置和沿革,如阳曲七



府营(今太原西缉虎营街)的普光寺是“建安中建,唐初赐名普照,中宗避天后讳改今名”;榆次东源涡村(今榆次源弋村)的永寿寺,是“建宁元年建……”等等,可见汉代这些地方已有了佛教的活动。另外近十余年来有些地方也传出有汉代立寺的遗存,如文水东岩寺等,都有待有心人继续查寻有力证据和论证。

当然,山西佛教最集中的代表是五台山。五台山《清凉山志》为今人所共知,此志由明代万历年间的镇澄法师初修,民国二十二年净土宗十三世祖印光大师考订增修。志中记大显通寺沿革,说:“汉明帝时,滕(即指摩腾)阌(指竺法兰)西至,见此山乃文殊住处兼有佛舍利塔,奏帝建寺。”指明显通寺是汉明帝时所建,是由最早、最著名的两位印度菩萨即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请旨建造的,之后“度僧数十居之”。但学界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五台山佛教始于北魏。根据是唐代僧慧祥所著《古清凉传》中载:“……至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按方位,这“大孚图寺”即今显通寺。显通寺从立寺至元曾多次改名,直到明太祖才赐名大显通寺。显通寺被认为是五台山的开山寺院。据此认为是在北魏时佛教传入五台山,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慧祥,唐《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中都无法记载,据《古清凉传》中记他的行止,可知他在五台山活动是唐高宗时期,长安僧人。曾于高宗乾封二年(667)和总章二年(669)两次朝拜五台山,第二次在山上住了两年。《传》记载的是他个人亲历事和听到的传闻。所记大多为事证,即目所能见的遗物和当地人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大都被理解为佛、菩萨现化的证据,而理证欠缺。慧祥记述了过往许多僧俗赴五台山参礼的奇遇,有的能说明是高齐、大隋、本朝(初唐)时人和事,有的久远到难说具体年代便以“昔有……”来叙述,如记载“昔此寺(大孚图寺)有三沙弥每闻宿德话有灵隐,遂相将岩谷访觅”,结果受肥黑人指引在一“树旁伫立。日午后,云间飘然如匹帛,下落树前,乃一丈夫也,散发高耳,色如桃花……”后来“腾空而去”。后来三沙弥又受人指引入洞穴,见银瓮美酒等。近似六朝志怪故事。这个故事里值得我们留意的有二:一、“灵隐”修行的并不在“大孚图寺”;二、沙弥所见的人“散发高耳,色如桃花”,从装束到肤色都不是中华人物。又台怀在群山腹地,自古以来,从北路进山须经鸿门岩,直到民国初年“鸿门岩上岭已极艰险,不料下岭更难,乱石当道,势复陡绝。马足屡为之蹶,险峻处真是羊肠小径,旁临深涧。余在架窝中……颠越特甚,头目眩晕”(蒋维乔《五台山游记》)。试问,在此之前一千四五百年前的北魏皇帝(建大孚图寺的是文成帝还是孝文帝,另文专门探讨)是怎么就巴巴地找到台怀,并知道台怀北的这座小山峰,酷似当初释迦佛修道



的灵鹫山呢？

季羨林先生曾经著文说：佛教传入中国“肯定早于汉明帝……至晚在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佛教的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这一观点是当代许多佛学界大家的共识。至于佛教传入的路线：一是海上；二是西域丝绸之路；三是经四川、云南到缅甸再到印度的川滇缅古道。似乎都与山西无关。我们知道，汉代河东实际指今山西大部，被认为“土瘠民贫”，加上战乱频仍，经济、文化都失去了战国时期的光彩，当时整个北方缺乏修纂方志的条件和人才，因而那数百年间，山西的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极其模糊，遑论宗教。缺乏记载，可想而知。至于称汉时五台山太孚灵鹫寺是摩腾、竺法兰所建，也有当然之理。东汉、曹魏时尽管佛教已在中华广泛传播，但朝廷明令不许汉人出家，更不能立寺了。有僧人的栖修处，必得托番僧之名。腾兰之名早已远播，借他们之名，顺理成章。据《四川通志》记载：大邑县雾中山寺也是腾兰于永平十六年创建的。可见，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具体情况虽阙如，但作为早期域外高僧来中华的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象征，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以上叙述均为理证：说理推证，但并非无根之谈。前面曾提到光绪朝《山西通志》载当时山西境内尚有 16 处汉代建“寺”遗迹。至今绝大多数已湮没无考了。幸而还有临县“正觉寺，在（临）县西九十里，汉时建”留下有“十二连城”，证明着正觉寺建于汉的可能性。“十二连城”是十二株侧柏，整齐地排列在寺东山丘上。其中最高的 19.5 米，最低者 8 米，胸围最大者约 4.8 米，最小者约 2 米多。柏树生长本来就慢，在干旱贫瘠的黄土山梁上生长更难与平原川地相比，长成如此雄伟的阵式，需要多少时日呢？林木专家认为这 12 株侧柏树龄当在 2000—2200 年之间。据《临县县志》记载，正觉寺方圆十多里内原是一片片柏树林，有许多巨型树木被冠以各种人物和星宿名。现在大部分被毁，只有和正觉寺一同长大的“十二连城”，述说着它久远的历史。古人曾说：“学者不可以不深思熟虑而慎取之。”就是说对待问题要尊重史实，合理推断。我们认为古志书记载的山西汉代立“寺”，不是空穴来风，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佛徒在此活动。由此，说汉末佛教已传入山西大致是不错的。

自汉末佛教传入，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时期，包括了三国两晋南北朝近 400 年。这一时期主要是译经和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碰撞、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南北有明显的不同，东晋及南朝比较重视佛教义学传统，对佛教理论有创新发展，而北方大体偏重兴办福业建造、造像、立碑、禅修神



异。第二阶段是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八大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即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第三阶段自宋开始,中国佛教步入与中华传统与民众更密切结合的新阶段,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宋时净土宗与佛教各宗派融会,并吸收中国传统信仰和儒家观念,成为一种净土信仰,并发展成以念佛为内容的会社。会社活动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往生净土和现世利益结合在一起,深入民俗。明清佛教情况比较复杂,上层统治者对佛教控制利用,读书人(包括学问僧)钻研佛理,甚至以之作为观察人生、批判道学的武器。在广大民众中,佛教信仰已成为民俗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

山西佛教在佛教中国化和民俗化过程中都曾占有过重要位置。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在五台山兴修大孚灵鹫寺为主的十二院,佛寺兴建遍布全省。北齐也大兴佛事。两朝遗迹,至今犹存。这一时期,山西的高僧辈出,全是中国佛教史上座标式的人物。如当时被称为“手印菩萨”“东方菩萨”的真正中国僧人第一人——道安。他早期传播禅数学,第一站就在濩泽(今山西阳城),然后又北上飞龙山(在今山西浑源),一路上讲习佛理、传播佛教,广收门徒,其中就有楼烦(今山西代县)人慧远。慧远协调佛儒道,将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神不灭论”,强调三世因果和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始祖。还有奠定净土宗理论基础的雁门(今山西代县)人昙鸾,曾被梁武帝称为“肉身菩萨”,被东魏国主尊为“神鸾”。由齐入唐的道绰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他证“称名念佛”为正业,创手掐念珠口宣佛号的修行方法,标志着净土宗的形成。道绰弟子善导,在今交城县玄中寺跟从道绰学净土法门,后到长安弘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二祖。可以说山西是中国净土宗的故乡。东晋后期平阳人法显西行求法,成为第一位到达天竺(印度)的中国僧人。在近400年的魏晋时期,山西全境佛教兴盛,佛徒不但自己求解脱,也求社会群体的安宁福祉,他们这种为己、也为人的信仰主张,得到社会上下层的接受。特别是高僧们为了信仰和事业坚忍不拔,勇猛精进,随时准备献身的殉道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隋唐时期,除个别帝王外,佛教信仰民间普及,佛教理论成为隋唐思想史的主要部分。佛教各宗在山西都有重点寺庙,五台山高僧纷至沓来,各立道场。唐代《法苑珠林》记载,藏有佛祖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塔,除五台山外山西境内就有5座(全国共有19座)。从北到南依次为:齐代州城东古塔(今忻州代县城内)、隋并州净明寺塔(今太原晋源区)、隋并州榆社县塔(今晋中榆社,已无)、周晋州霍山南塔(今临汾洪洞广胜寺塔)、姚秦河东



蒲坂塔(今运城永济市中条山上栖岩寺,现寺、塔皆不存。仅遗“栖岩寺舍利道场碑”)普救寺莺莺塔)。这些塔至今有3座尚存,成为信众膜拜的人间圣境。太原崇福寺唐代成为皇家寺院,寺里有李唐太原起兵时的号令堂,有供奉着武则天玉雕像的御容殿……当时国家规定各地各宗派的高僧都要到太原崇福寺来讲经等等。由以上,隋唐山西佛教盛况可见一斑。宋辽金元,山西仍是全国佛教重点地域,建寺庙,刻大藏,出高僧,种种佛事活动,成为国家为争取民众而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对于增进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对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时期山西佛教最充分地表现出了中国佛教民众化、世俗化以至功利化的态势。查山西各地方志传,城乡村落无不建有寺庙甚至一村有多所,至今山西各地明清寺庙遗构,可以说俯拾即是。总的说有两大特点:一是佛教的宗教性减弱,佛学理论被搁置,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寄托,感情需求。认为只要诚心事佛(菩萨),就能让人摆脱当下困顿,直至获取现世利益。认为佛教教义就是教导人趋善避恶,慈悲为怀,不知其他。二是佛教和儒道思想、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地方先贤等等紧密结合。许多明清寺庙中,佛、菩萨、圣母、龙王、奶奶、马王爷、某某真君……神佛灵异齐聚一寺,享受着人间烟火。至于寺院附属的壁画、雕塑则更是称得上“丰富多彩”。如殿内是如来佛祖、菩萨,南殿是大罗真人、许世英(不识是哪位神仙)、桃花女……大殿外的浮雕是八仙过海、蟠桃会……还有的殿内塑像应当是金刚力士——属佛教系列,百姓却称之为站殿将军,塑像又是“盔甲披挂,背插九杆小旗”,完全是清代戏文装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佛教对民俗的影响更是深入到人们说不清缘的地步。如晋中以北(漫延到陕北)称出嫁的女人为“婆姨”。原来,元魏、北齐直到唐初山西净土信仰盛行,“称名念佛”普及,在家信众男子都称优婆塞(男居士),女子都称优婆夷(女居士)。随着时间推延,不一定是信众,对女子称“优婆夷”成为一种敬称。再向后,更省去了“优”字,“婆姨”成为泛称。又如,至今全省许多地方都在四月初八有大庙会,唱戏、赶集,热闹非凡。问当地人四月初八是什么日子?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殊不知,这个日子乃是佛教典籍明确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生日,至少在公元5世纪初已经作佛诞日庆祝了。又如农历七月十五人们各扫墓祭祖。已经少有人知道这起始于南朝梁武帝。根据佛经,七月十五这一天僧俗各出钱供养三宝,称盂兰盆会,是佛教的大法会日。留心考察,佛教深入民俗的例子,举不胜举。

我们也注意到,明清以来,山西佛教对义学的探讨,大体上蔑然无言矣。历史上的



山西佛教高僧辈出,净土、华严、法相、禅、密等各宗具高才卓识的高文大册,为中国佛学留下了光辉篇章。但明清以来,无论是嘉靖、万历到明末清初的禅学勃兴阶段,还是直到近代一大批居士,企图通过研讨佛理,借助内心对佛教的敬信,以佛教(佛学)来度世、救国,这其中包括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都少有山西人的身影。无论僧侣士庶,山西人都热衷于朝山进香、念佛法会、放生拜忏等佛事活动,似乎属净土信仰的佛事实践就是佛教,不断远离理想而追求功利了。

二、山西道教的发展及主要遗存及价值

道教是我国(主要是汉族地区)土生土长的宗教,带有浓厚的中华民族古代宗教意识色彩。近现代研究者认为道教形成于汉末,稍迟于佛教正式传入时。道教信仰的本质是神仙信仰,不论是通过巫术与神仙沟通,还是通过方术、养生修炼成仙,都是以相信神仙的存在为前提,以追求现实人生幸福为目的。最早的太平道就是幻想在大地上建立一个太平乐土,由河北巨鹿人张角开创。在汉末世道不宁的情况下,下层百姓企望太平,太平道顺应人心,号称有徒众数十万。张角派弟子“以善道教化天下”,“分赴八州”,势力遍及青(今山东淄博一带)、徐(今山东南部及江苏长江以北)、幽(今北京西南一带)、冀(今河北柏乡至临漳县一带)、荆(今湖南常德东北一带)、扬(今安徽和县、寿县、合肥一带)、兖(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豫(今安徽亳县以北一带)。只是由于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被统治集团剿灭,太平道也就销声匿迹了。而与之同时的张道陵,被认为是道教的创教者。他创立五斗米道,参加者交五斗米,先是称可以治病,到张道陵的孙子张鲁,道团形成,逐渐成为以教团管理、行使政权作用的政教合一社会形式。五斗米道遍行于巴、蜀、汉中,即今四川中、北部及陕西南部一带。至曹魏时期成为一个地方政权。至晋朝在统一政权下,张家后人只作为宗教领袖且移居江西龙虎山了。

回溯道教早期情况,可以看出,毋论太平道或五斗米道,其主要势力不达山西。道教在山西的大发展始于北魏。当时东晋的五斗米道内部分裂,残酷杀戮,创教时的基层组织形式,成为“天师”、“祭酒”(组织首领)父子相传、巧取财物的工具,已引起广大教民不满。嵩山道士寇谦之立志改革,献上假托天神授予他的经书,得到北魏太武帝赞赏,于是依靠皇权,“清整”道教,道教从组织到教义以及与当时皇权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称“新天师道”。后来南朝刘宋朝陆修静开创“南天师道”,寇谦



之领导的就被称为“北天师道”。寇谦之“道业大行”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平城(大同)。
《魏书·释老志》说太武帝在平城东南修了五层的天师道场,把寇谦之在嵩山的40多个弟子接到平城,“月设厨会数千人”。太武帝尊崇道教除社会和经济的原因外,从政治历史来说,鲜卑人一直自称是黄帝二十五子中昌意的幼子之后,那么,鲜卑人与汉人都是黄帝的苗裔了,他们信奉道教就拉近了与治下广大汉人的关系。寇谦之在平城(今大同)的活动遗存,在清顺治、乾隆《大同府志》和道光《大同县志》中都没有记载。当然以上两志都是当时现任官员根据在任时考察现状而作,极少考证。只有“出自学者之手”的光绪《山西通志》中载:“崇虚寺,在大同县南三里,始光(北魏太武帝年号,424—427)初建。”原注:“始光初,嵩山道士寇谦之奉道书献阙,遂起天师道场于代都(孝文帝迁都洛阳,称之前的平城为代都)东南。显扬其法,宣布天下。真君(太武帝年号,全称为太平真君)三年(442)从谦之请,亲备法驾诣道坛受符箓,自是每践位初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年号,491年)八月以京城里宅栢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祇崇道法,诏起道坛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仍名崇虚寺。”

隋朝时间短暂,朝廷崇佛抑道,道教以符箓行世。

唐朝是道教十分兴盛的时代。六朝以来门阀制度盛行,李唐皇室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尊李耳为“圣祖”。老子被尊为道教三清中的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太清大帝。李渊曾颁布《先老后释诏》,这样道教就成为唐朝的国教。朝廷下令在各地大造道宫、道观、老君庙,塑老子像,定《道德经》为上经,命百官学习。道教进入它发展史中最辉煌的阶段。山西当然也不例外,查史志,唐代建立的道观遍布城乡。这一时期,山西在道教史上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事件和人物。

据《历代崇道记》和《正统道藏·唐明皇御制庆唐观纪圣铭》中记载:武德元年(618)在山西浮山县羊角山(今名二峰山。山顶有泉,大旱不竭。)上,“老君乃洗然华浩,白骥朱髦,见(现)此龙角山(所记事太不平凡了,称羊角似乎不敬,所以称之为龙角),示我龙兴之兆,语绛州大通堡人吉善行曰:‘吾而唐帝之祖也。告吾子孙,长有天下。’”武德元年李渊刚刚在晋阳宣布起兵反隋,国号唐,天下还纷争未定,太上老君现形明白告诉一个有缘人,说自己是唐皇帝的祖宗,唐将长有天下。这是多大的精神支柱啊。唐代山西还有两位影响甚大的神仙。一位是八仙之首吕洞宾。对于吕洞宾的籍贯,各书说法不同。有的说他是李唐皇室子孙,则天朝受迫害而入山修道。有的说他是礼部侍郎吕渭之孙,吕渭是河中(蒲州)人,吕洞宾祖籍就是河中了。据说唐代在吕洞宾的老家



永济县永乐镇就修了“吕公祠”，纪念这位著名神仙。吕洞宾在道教史上真正的贡献在于他和钟离权倡导的“金丹道”。这是一种内丹修炼术。内丹就是把人体当作“炉鼎”，以体内的“精、气”为药，运用“神”去烧炼，使精、气、神凝为神丹，或叫内丹。体内内丹结成，人就“无饥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兕不能伤，而为陆地神仙”。之前的道教符篆派难得验证；丹鼎派用金银铅汞炼丹，唐朝就吃死了6个皇帝；义理方面虽有发展，却艰深难普及。金丹道给道教开辟了一条性命双修的途径，大有贡献。另一位神仙就是八仙中倒骑驴的张果老。张果老本名张果，身世不详，但《旧唐书》《资治通鉴》《太平广记》上都有记载。他是初唐时的著名道士，隐居在恒州、中条山，往来于汾晋之间。现在浑源北岳恒山还留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遗迹。张果老在道教史上的贡献是《果橙问答》所记录的星命术。我国占星术大约在商代就有了，到春秋时发展成为星象学，当时还有很普遍的算命术。到唐，张果和李橙将两者结合记载成书。星命术就是把星象和生辰八字及干支神煞结合起来，用来分析一个人的人生命运。至今这也还是道教法术的一项内容。

唐之后山西经历宋辽金三朝，300余年间道教理论深入发展。宋初有陈抟创“无极图”，宋神宗时有张伯端作《悟真篇》。陈、张等一批道教有识之士摆脱了过去道教符篆鬼神等不经之说，转向探求炼养，建立并基本完成内丹理论和修持方法。在宗教实践方面，三教合一趋向越来越明显，道教中出现了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全真道主张融合佛道，并吸收儒家的伦理说，成为一时之盛。这些在山西都有遗存。如位于吕梁市方山县的北武当山，这是一座道教名山，首先因为它有自然形成的玄天大殿正前方水火峰顶上巨大的龟、蛇二石。古文献称龟蛇合体便是北方玄武大帝。至南宋，玄武神有了具体形象：披发、黑衣、仗剑、足踏龟蛇。到明代玄武崇拜极盛，在道教中的地位仅次于三清了。北武当山成为道教名山怕也和这龟蛇二石有关吧。

再就是《汾州府志》里记有明代的一幢碑《石州重修上凤山希夷庙记》。石州即今离石，上凤山碑文中又称三阳山，《山西通志》里称为云凤山，即离石城北的凤山，今已建成凤山公园。至少在唐宋时这里便是一座道教名山。碑中所称希夷就是宋初的陈抟。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唐末五代宋初人。碑文中说他早年“入北武当山，辟谷练气廿余年”，后来到华山云台观练养。宋初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晚年又回到石州，“蝉蜕于穴，乡人瘞其骨于山右二百步”。陈抟在民间留有许多传说。史传记载，端拱二年（宋太宗年号，989年），陈抟“化形（华山）莲花峰下”，去世了。但离石明碑中则



记:数年后“陕右人过(石州),见而拜之,作诗曰:古洞岩前碧水流,白云缭绕凤山头。几年不见先生面,今见先生在石州。”毋论陈抟与山西有怎样的缘分,他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是道教的重要理论家并影响了宋代理学。

现代人喜欢旅游,山西从北至南有不少国家级的旅游点。浑源悬空寺是尽人皆知的,一般都是赞叹它的年代久远、建筑工巧,从文化角度来说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三教殿”。原来殿后壁嵌有一块石碑(现在移至三宫殿与地藏殿之间了),碑是金大定十八年(1178)所刻,前一部分是“释迦宗从之图”,后一部分是“三教之图”,有千字左右的文字。殿中佛教释迦佛居中,左为儒宗孔子,右为道宗老子。三教并排而坐,雍穆熙和,享受着人间的敬奉。据说后世有的地方也有三教殿、堂,不过都以孔子居中,大概是习儒业当了官的人们盖的吧。当代有研究者考证说,北魏时寇谦之所起的道坛,因离民居太近,孝文帝下旨“迁道坛”,所迁之新崇虚寺就是今悬空寺。就以今天的眼光看,悬空寺也符合寇谦之所要求的“上延霄客、下绝嚣浮”的要求。它上能延揽神仙,下离俗世尘嚣,与汉代以来的道教名山北岳恒山连为一体,似应就是道教庙宇。只可惜迁坛后不久孝文帝迁都洛阳,这里便冷落了,慢慢地成为佛寺。数百年后,金代三教合一思想盛行,老子在这里又占了一席之地。

元代立国时间不足百年,但道教在山西却留下了极珍贵的遗产,一是太原龙山道教石窟,二是芮城永乐宫。金代的王喆创立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要求徒众绝世欲、炼心性。王喆金大定年间死后,他的7个弟子各有建树,其中丘处机所创的全真龙门派最盛。丘处机在1121年远赴雪山见成吉思汗,受到器重。整个元代北方道教以全真龙门派为主,我省的道教官观都属全真道。

太原龙山道教石窟。太原龙山南脊唐代就建有昊天观,也叫静居观,开凿有两间石窟。唐之后战乱频仍,昊天观荒废了。元太宗六年(1234)丘处机的门徒宋德芳号披云子,游太原至龙山,见到此处风水胜景,心生欢喜,集资募匠,恢复昊天观并又开凿了5座窟室,明代又开了一座。现在共存有8座道窟。这是我国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呈现出与佛教石窟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运城芮城永乐宫。唐时为纪念吕洞宾,曾在其故乡永济永乐镇建有吕公祠,宋金时扩为道观,元代随着全真道地位的提升,永乐观升为永乐宫,是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元代兴修永乐宫用了100多年,几乎和元朝同始终。除了它的宗教意义外,永乐宫还是一件建筑和壁画的艺术宝库,永乐宫壁画是世界绘画史上难得的巨制。应当特别



提到的是,1958年为三门峡水利工程需要,永乐宫被从位于水库淹没区的永乐镇整体搬迁到了20公里外的芮城县城北郊。搬迁期间壁画被分割拆移而后又重新拼接,今天完全看不出搬动过的痕迹。这应当说是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

明清两代朝廷对道教控制比较严格,道教越来越世俗化,加之道教在义理方面缺乏精致内容,常用道家哲学经典《道德经》中的语句来文饰道教鬼神信仰的核心内容,常常是因其昏昏欲使人昭昭,当然让人觉得玄而又玄了。以致明代以来直至近代,道教日趋衰微。近年来养生学的兴盛,其理论里面包含了不少道教内容,不过需要将道教贵生炼养和符咒占卜等区别开来,尊重并发扬道教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内容,为社会人生服务。

三、山西人的精神归向及信仰特点

现在许多研究道教的人常常引用鲁迅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对这句话的诠释,见仁见智,难有定见。近代以来宗教研究者认为,作为一种宗教应具备以下几点:一、要有基本宗旨或叫信仰;二、要有自己的教义、学说、戒律,也就是宗教理论;三、要有宗教实体,包括组织、设施、活动等。这三项是实实在在的,由这三项而形成某种文化和相关的文学艺术、民俗等。

道教作为宗教形成于汉末,盛于唐,至宋已组织涣散。虽有宋真宗、徽宗的偏好,和陈抟、张伯端等高道的深入理论探讨并发展,但其影响远不如唐代。元代佛道斗争其实很激烈,道教曾遭两次焚经之灾,已逐渐走向低潮。明清之后,道徒大部分热衷符命、风水、祈祷、诵经等,甚少崇高理念和高雅情操了。那么,道教创教前从夏商周到汉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难道没有精神信仰吗?明清时代中国的根柢又哪里去了?鲁迅的话表明他和他同时代人一样,把道家 and 道教混同为一体了。“道教”作为一个词,在南北朝以前是诸子百家共用的概念。那时诸子百家无不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称之为“道”,以“道”教化众人,便称为“道教”。使用“道教”一词最早的其实是儒家,把尧舜禹汤文武的先王之道和孔子的五经之道统称为“道教”。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取“以善道教化”的意思,也说“道教”,但并不是作为宗教而称呼的。直到北魏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现身,让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这才把尊老子和他的“道”的这—种信仰定为“道教”,别家也不再用“道教”这一说法了。说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是道教,这种说法是不严谨的。



至于山西则自古以来就有别一样的文化渊源。山西是中国从远古起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地域之一,大体上晋阳(主要包括今太原、晋中、吕梁)及以北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这里古代农耕文化都比较落后,没有“道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传统也较薄弱。寇谦之凭皇家支持兴盛一时之后,朝廷南迁,新天师道在此也就默默无闻了。隋唐以后,道教只在少数地方传播。这一广大地域接受佛教也注重修福、行善,表现在大事建寺、开窟、度僧。僧人则重坐禅、诵经、修行等,僧俗都注重实践,不像南方重讲经说法、探讨义理。

晋南(主要包括今临汾、运城),这里是中华民族摇篮地带,自古便有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封在安邑(今夏县)的说法——这些都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可以说,晋西南汾河、涑水流域形成过中华最早的文明。相应的思想信仰,首先是对祖先丰功伟绩形成一种族群历史记忆,将远古有功于民众的氏族领袖演绎成神话故事,从而立庙祭祀,盘古、伏羲、女娲、嫫祖都有庙宇,都有规定的祭日。新绛阳王乡有稷益庙,按当地说法,后稷和伯益是大禹治水的两位助手,后稷“教民稼穡”,伯益善牧与猎,都是大有功于民众,千百年来百姓一直在纪念他们。至今仍影响较大的如万荣县的汾阴后土祠。古代称天为皇天、地为后土,汉武帝时就亲自坐船来后土祠祭拜土地神。以后历代都有或皇帝亲临,或派钦差来祭拜大地母亲之神。其次由于这一地区有较早的文明,民众的文化素养以正统为主导,如关公崇拜,虽然道教、佛教都将关公列为神或护法,但中国最大的关帝庙——解州关帝庙着重弘扬的是他的“忠义”,这是儒家理念。官方看重的是他的忠,民众景仰的是他的义,关羽的忠义精神成为家乡人民的楷模和骄傲。

道教的来源从理论讲是秦汉之际的黄(帝)老(子)道,但民众信服的主要是源自巫术、神话等的早期自发宗教。民众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希冀在造神。他们相信“生前正直,死后为神”,他们通过对神、圣、贤的崇拜,在编织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对人物的评价,对未来的期望。这一点在过去交通比较闭塞的地方表现得更加鲜明。长治、晋城就是这样一块充满神话和信仰非常活跃的土地。这里处晋地之东南,在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中,古称上党。这里既有许多和上古神话有关的人物和地名,又有不少当地独有的神祇。前者如共工所触的不周山,愚公所移的太行山、王屋山,精卫填海衔木石的西山(即发鸠山),尧帝长子的封邑长子县等,都在上党。后者如晋东南许多县乡有三峻庙,祭祀的是射日的英雄后羿。沁县伏牛山龙泉寺供奉的神是先轸和狐偃,



正殿的壁画是城濮之战，先轸入史和城濮之战有关，但城濮实在和长治没有关系。陵川县不少村子有二仙庙，供奉的是两位民间少女，据说她们受苦而成仙，帮助过抗金的宋军，还能应百姓之求而降雨，百姓就长期祭祀她们了。总之，这里民间信仰非常活跃，山山有寺，村村有庙（多数还不止一座），所祭拜之神灵有很大随意性。

山西百姓所信奉、信服的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我们姑且称之为精神归向（精神的趋附和依存），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不以成败论英雄。论古人不和官方正统评价一致。如对尧的长子丹朱，按《史记·五帝本纪》：当臣子建议让丹朱嗣位时，“尧曰：吁，顽凶，不用。”“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尧说他的这个儿子道德上有欠缺，还好和人争辩，不可以将天下托付给他。有论者认为长子命名不由丹朱，是后来事。按，周武王时这里已经叫长子，长子西边浮山县就是丹朱的食邑，阳城还有丹朱墓（据史志，平阳也有丹朱墓）。丹朱可能不具备舜那样的德行才干，但没见过他有什么不堪的记载，山西人一直以地名和立庙来记住他，也许其中含有爱屋及乌的心结吧。又如忻州市代县的赵杲观，是为纪念战国初期代国的一位大臣赵杲。代国被赵襄子所灭，赵杲没有像当时人一样投靠新主，而是带领代王的子女逃到代国南部的天台山深谷中，开荒种地，最后终老于其地。直到北魏，当地人建庙纪念这位孤忠不贰的悲剧人物，香火传承，延续至今。

二是不以地位论尊卑。陵川有祭祀两个女子的二仙庙。沁县华山老君顶上一位艰辛建庙的普通老人身死之后人们为他塑像，年年祭祀，永纪他的功德。代县赵杲观有座送醋老人庙，庙里供奉着送醋老人、钉盘碗师傅；还有一处李仙庙，供的却是一位担水和尚。这些普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来，却因他们终生行一善而受到人们的永远纪念。

三是历来认为山西文化欠发达，其实自古以来山西民风淳朴、务实，不事奢华，这里的文化底蕴深沉、厚重，他们的精神归向表现出“好谋而深”“和而不怒”“忧深思远”“恬以愉”，重“昌言儆戒”“垂衣之化”（引号中为柳宗元《晋问》中语）。如别的地方祭祀什么“风尘女子”（妓女）之神、花神、厕神、井神、车神、船神、染布神、床神……在山西没有那么多“淫祀”，人们虽然也常说“离地三尺有神明”，那只是警戒人要讲良心罢了，不会去胡乱祭拜。山西人敬重鲁班，奉为工匠之神，山西就有了许多传自千年的优秀建筑。山西人也企盼多子多福，就村村社社有送子娘娘庙，有的地方观音菩萨就代行这个职责了。山西人相信“物老成怪（灵）”，所以许多古树被人缠上红绸礼拜祝祷。



1990年代初出版的《三晋文化研究论丛》中记载了这样一件求雨的趣事：据说自古以来至抗战前，上党地区就有祈雨驱魃（旱神）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还不能事事胜“天”，这习俗又恢复了。1959年秋季大旱，农民开始祭龙王，共9天。第一个3天叫“敬龙王”，黄袍加身，烧香敬果。如无雨，第二个3天叫“晒龙王”，村里年轻人抬上龙王在干涸的河床里转，然后抬回庙宇。如仍无雨，第三个3天，黄袍剥掉放在干河滩，由人撒尿，叫作“尿龙王”，虽属大不敬，也还有人理睬。9天内无雨，裸露的泥塑龙王，就一直躺在河滩里，无人理睬。直到雨降河满，泥塑龙王才被人抬回原来的庙宇。这事情反映的是乡人的务实精神，他们开始是信而不迷，如果神灵始终不解决问题，那就迷而不信了。这些也可以说是山西人的信仰特点吧。他们纯真务实，崇尚仁善，那些为百姓、为他人作出牺牲的人，人们会以神仙来敬奉，永志不忘。

如果以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以上也可以归为道教，本来道教的根脉之一就是远古时代鬼神崇拜，再加上万物有灵的泛神论观念，这些才体现中国人信仰的“根柢”吧。

四、佛寺道观的文化意蕴

20世纪90年代初旅游业刚起来时，流行一句话：“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是人们对许多旅游活动的自嘲。走马观花赶场似的旅游，不但得不到休息，反而更增加了人们的浮躁情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应该就是不知道到寺观是为着何来？以至现在不少人去寺、观就是为了祈福，是求佛菩萨、老君、真人、娘娘……保佑发财、得子、无灾无病、考上大学……去焚香顶礼，对寺院、观堂只是跟着导游走罢了，加之有的导游只是讲些经不起推敲的“神话”故事，让人觉得无趣。看看旅游介绍册，许多是叙述寺观有多少年历史了，哪座殿的脊、梁、斗拱……是怎样的等等，虽富有知识性，但大部分看不懂，也并不想知道。对寺、观的雕塑壁画导游不太讲、顶多说些“栩栩如生”啦，表现出古代能工巧匠高超智慧、工艺啦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但总有种隔膜感。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谈道：“讲文化离不开人，否则就不成其文化，譬如讲酒，酒怎么好，用什么水，加的什么料……那是酒的生产过程，那不是文化。要有人去喝，才是文化。茶文化，茶产在哪里，怎么制作，这也不是文化，茶文化首先要有人，茶在人的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人怎样对待茶，才是文化。”

我们山西金元以前的古建占全国存世量的70%以上，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宗教建



筑,当然主要是佛、道教建筑,它们表达了怎样的人文情怀和宗教感情呢?佛教从东汉传入(这是依照成说,实际还要早)后,汉(曹)魏时只许梵僧立寺,佛寺自然还是依照天竺式样称宫塔式:基座平面四方形,上面是按一、三、五……单数层级,层层叠加,当然是一层比一层小,塔外每层墙面上布满佛龕,象征“天宫千佛”,所以叫“宫塔”。也就是一般所称浮图、佛图。宫塔形制在山西没有记载。到北魏时佛事大盛,佛教建筑和中华传统结合,出现了楼塔式寺院。即还是单数层级的楼,还是方形;但里面是一尊处于正中的佛像,依据楼的层数决定佛像的高度,重楼的顶上置“相轮”,也叫承露盘、轮盖,上面还加请花、伞盖。下面的楼是汉地形制,上面的相轮、伞盖则保留佛教特色。重楼四周绕以堂阁,堂阁之间以阁道相连。总之楼塔式的寺院是以楼塔——内供佛像——为主,其他建筑围绕它而建。大致楼塔层数越多则级别越高。山西最早的楼塔记载出自平城(今大同),北魏道武帝刚建都平城,便于天兴元年(398)建造了五级浮图,除佛塔外还有圣殿、讲堂、禅堂、沙门座,是一处以佛塔为中心、功能齐全的大寺院。之后,献文帝又在皇兴二年(468)建造了七层浮图永宁寺。除平城外,晋阳(今太原晋源区)也有三级大寺,这座寺院的入志,是以北魏末年尔朱兆在这里杀死了孝庄帝而知名。隋初,释宝澄在河东(今运城)普救寺建造百尺大像,“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坊下院”,可知这所寺院也是以内设佛像的三层楼塔为中心。隋唐之后佛教中国化完成,佛寺也呈现出中国特色,就是以院落的形式,把具备各种功能的堂宇组成一个院子,典型的叫七堂伽蓝。七,表示完整,即需要有塔、金堂、讲堂、钟鼓楼、藏经楼、僧房、斋堂。后来寺庙越来越大,就成多院式,当然其他院落的配置也就不一定全具备七堂了,视条件和情况而定,但都叫廊院式。最早的七堂伽蓝都有回廊连接。寺院从汉末到南北朝 400 多年间的型制变化,反映的是对佛法理解的由梵而华的变化。宫塔式是一元独尊的,无论塔身有多少小龕,都是同一样式,表示佛的无量化身。人们瞻礼时感觉到这就是佛的宫室,巍峨高耸、庄严肃穆,令人心生崇敬,立意归向。楼塔式是佛教与中华传统结合的产物,寺庙主建筑外观是楼,它的性质是佛塔,内供佛像。又由于这一时期佛教已经盛传,所以有了具各种功能的殿堂屋宇。当然其中为主的是礼佛课诵的殿堂,别的是为礼佛课诵的人——僧人服务的。

完全汉式的廊院式,蕴含了中国佛教的多种宗教与文化内涵。寺院的大门叫山门,也叫三门,表示进入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塔,内安置佛舍利(一般是法身舍利),是佛法的象征。金堂,通常称佛殿、大殿,由时代或宗派的不同,大殿内安置的是



本尊佛,供瞻仰礼拜祈祷。庄严的佛像使人心生敬仰。早期塔和大殿是伽蓝的中心建筑。讲堂(法堂),是演说佛法、皈依集会的地方。殿内高高的佛像前设法座,也叫“狮子座”,当初佛以无畏音说法,如同百兽之王的狮子(印度以狮子为百兽之王)发出吼声,令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也使外道、恶魔生畏惧。狮子座喻后世高僧讲说佛法,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隋唐之后,七堂伽蓝型制发生了大的变化,回廊没有了,而增设许多殿宇。五代时流行设罗汉殿,供养五百罗汉。宋代以后大都在大殿两旁或另立别院,分别供养,如观音殿、地藏殿、伽蓝殿、祖师殿。根据地域或所尊宗派,有的是文殊殿、普贤殿……释迦佛(或三世佛、五世佛),令人景仰,但成佛大不易,菩萨就成为人们更感亲切、便于亲近的精神寄托。据佛经说,众生如果遇难,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使其得到解脱。所以在诸多佛菩萨中,观音菩萨在普通民众中受到最为广泛的崇拜和信仰。又据佛经说,释迦牟尼佛曾嘱咐地藏菩萨,要他在释迦佛入灭而弥勒佛尚未降生世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普度众生,为此他发大誓愿:人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所以他也是拥有最多信奉者的一位菩萨。唐末以来佛教普及于大众,根据不同的精神需求各色人等也在佛门中寻求自己的心理寄托,寺庙中便出现了诸菩萨、罗汉。还有一个重大变革,便是寺院不再以塔为中心,许多寺院没有塔,即使建塔也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后、两侧,寺庙依中轴线纵深布置作院落布局。

汉晋六朝时期,寺院大多建立在通都大邑,这是由于早期梵僧建寺是受皇家、贵族供养,不少是由贵戚“舍宅为寺”,只需在宽阔的院中立塔,便成为礼佛场所了。隋唐开始,佛教昌盛,各宗纷纷创立,僧众为了潜心修行,证悟佛果,许多开山祖师便避开喧闹的城市,建寺于山林间。也由当时朝廷政策,寺院都有“常住田”(国家给寺院土地,或僧人开荒种地,以土地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口分田”(僧人廿岁受田,六十岁退田),僧人自己种地解决温饱,寺院可以不必依附权贵,逐渐地,寺院大多进入山林。特别是禅宗提倡农禅,“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为禅门代代奉行的清规,以至出现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不过僧人们在山林中开垦荒地、植树造林,保护水源,大凡山寺周围一般山青水碧,百灵自由。山本无名,是僧人结茅行道于前,徒众和信众共襄佛事于后,经过长期草创,经历多少代才形成“名山”,现代人才享受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灿烂的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清静地,得以荡涤灵魂,得一时的心神净化。

道教从创立之时,便依中华传统居住原则建造宫观,它所遵守的是以宜居为第一。